

· 主编心语 ·

博士生的成功之道(34)

——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2014年元旦。这一天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数九寒冬。但天气也不是那么冷,至少当我在室外走动的时候,空气不是那么冷,也没有记忆中冬天那种嗖嗖的寒风。这当然有气候学和气象学方面的原因。其实,在植物园里,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花儿像在春天一样竞相斗艳。在海南三亚,甚至在比昆明、广州、深圳靠北的南方城市里,仍然有鲜花在盛开。

不知你想过没有——今天我们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看到的绝大多数花儿,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印子。它们是我们时代的产物。偶然,当我们真的在自然界看到奇花异草时,就会无比高兴。当然,勇敢的人们还能看到天山上的雪莲花。

回望人类社会,我们身边同样充满了时代的气息。中国的2014年元旦是由“嫦娥”和“玉兔”打开帷幕的。在报春的大合唱中,谁都可以板着手指头数出一串串我们时代的傲人科技成就来。

就是我们自己,不也是时代的产物?当我们回顾这几年豪迈的脚印,我们不妨找点时间想一想:花儿为什么这样红?或者说,时代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烙印是什么?

说来你也许不相信,对于个人而言,我们身上最深刻的时代烙印是学位制度。轻易从学位体系中退场的人,失去的不只是一张学位证书,你放弃的恰恰是我们时代最鲜艳的色泽。你环顾四周,在科技界、教育界……在各个界别,那些领军人物、骨干、冲锋在前的新生力量,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:学位。没有学位而又承担着重要责任的时代精英们,正在一个一个地由消逝的历史迎走了。

走在历史的主流之中是人生最富价值的事。人们常说,是雄鹰就应该有自己的高度。但遗憾的是新中国从成立那一年起,走过了多年个人没有这种“高度”概念的岁月。今天的许多人,依然属于那样的历史,他们的人生,少了一份时代的幸福,少了一些“花儿”的鲜艳。这只能怪我们仍处于一个落后的社会。

我在26、27岁之前的岁月,其实也生活在那样的岁月之中。新的曙光是在1978年升起的。但是,历史得从1977年说起。1977年夹在“文革”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,像一道分水岭,划开了2个时代。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,总

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——恢复高考。但恢复高考的意义远不止此。那一年,邓小平第3次复出,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工作。这以后的时间表是这样记录的:8月1日,邓小平同2位领导谈话,中国科学院的方毅和教育部的刘西尧。8月4日因邓小平的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,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,后来,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。作为这一系列会议的结果,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《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,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。这就是人们口口相传的“恢复高考”,当年冬天有570万考生涌向考场。但是,我并没有参加这次考试,因为我此时已经在高校:北京工业学院。由于考生的规模如此之大,历史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年和这一事件。但是,不该忘记的是,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2个,另一个即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》。这是一个更加值得我们重视的文件。因为这个文件,我们离新曙光的出现不远了。

翻开历史的一页,有时确也非同寻常,1977级大学生虽然参加了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,但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大学校门的,而研究生招生,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。我参加了考试,最初班上有几位愿意报名的,但最后只有我确实报了名。资料显示,1978年5月5日全国有63501名考生走进了不同的考场。结果,10708名考生录取为研究生。北京工业学院这年招收了39名研究生,在校生有3人录取,我是其中之一。虽然被录取了,可以说,没有一位录取的考生会想到毕业时会有硕士、博士的头衔,中国教育史还没有翻到这一页。这同样轰动的事件使曙光的升起越来越加快了。

不是没有人想到翻开这一页。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、范长江、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,开始拟定学位制度。1957年草案完成,但碰上了“反右”运动。1961年,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,草案未及完成,又赶上了“文革”。1979年是这个历史大变动“真格”的年份。人们回忆到,建立学位制度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,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。此后《学位条例》经全国人

大常委会审议通过,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。不同寻常的是,当时,作为《学位条例》母法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还没有出台。

人们真正没有想到的是,2年后,当第一批博士诞生时,新中国以国家的名义举行了授予学位的典礼。1983年5月27日,北京,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,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,典礼就在这里召开。而实际上,接受博士学位的人数会让你吃惊,一共18位。但他们代表了历史。他们的名字值得我们记住:马中骥、谢惠民、黄朝商、徐功巧、徐文耀、白志东、赵林城、李尚志、范洪义、单樽、苏淳、洪家兴、李绍宽、张荫南、冯玉琳、童裕孙、王建磐、于秀源。其中,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,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,4名来自复旦大学,另外2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。

翻开这一页历史是十分重要的,新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,从此有了人才方面的制度性保证。今天,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已经或正在获得这样的学位,并献身于所学专业。有人可能没有想过,为什么辛亥革命前后,中国要用新教育彻底埋葬科举制?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,有一天,看到一份资料,这才豁然开朗:现代教育体系是工业化的基础。想一想吧,封建社会没有工业,当然科举制就足矣。科举制只是一味为朝廷培养能帮皇家干活的人。这么说来,把接受教育看成是“升官”、“发财”和出人头地的渠道,是两千年来流传的意识,在新时代就不该有了。中国要有现代化,就要办现代教育。当中国要走向强国时,学位制度就必不可少。今天的改革开放,处处看到人们对高学位人才的渴求,这正是学位制度的初衷。顺便说说,我得到博士学位比这18位博士晚。1983年12月,我通过答辩,从英国回到北京工业学院。

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是一首十分优美并且深情的电影歌曲,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歌中用祖国情、家乡情、爱情和友情,揭示着生活和社会的真谛。我今天用花儿来比喻中国的学位制度,就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这样一个道理——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”!(本文资料来自2013年10月22日《北京日报》文章:“中国博士诞生记”)

文/冯长根